

展的背景下思考复杂的时空理论，有时候是非常痛苦的，然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许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冲击才刚刚拉开大幕！

时间危机与社会科学的实验

郦 菁*

社会学是对现代性的特征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过程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社会学最新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转型，即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或者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转型，即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兴起，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或者说一种特殊的时间结构，它和前现代的历史意识和前现代的时间结构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既可能是客观的，也可能是主观的。社会学和部分的历史学研究就要从原来对于时间的客观研究转向对于时间性的主观研究。换言之，“时间性”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什么是时间性？简单来说，时间性是有关过去、当下和未来三者之间的某种特定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方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时间性之间的更替。我们还可以说，时间性是有关某种特定的历史经验和有关未来的期待之间关系的建构。当然对于时间性有很多的理解，笔者只是粗略地举了其中两种。

自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特别在西方社会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平顺、阶级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特定的时间性就会被当作一种默会的知识，构成人们行动的基础，也构成学术和政治的基础，很少会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一旦社会秩序发生剧变，在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发生重大崩坏的情况下，大家会转而关注时间的问题。换言之，对时间危机的感知是对政治和经济层面危机感知的一个前

* 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

提：首先是时间发生危机，其次才是政治和经济层面发生危机。

什么是时间危机？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原有的时间性当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已经不能再维持了。自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时间危机，当然我们讲的历史都是以西方社会的历史为主。第一次是进步主义或历史主义发生的危机，第二次是当下主义发生的危机。

所谓的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是同一种普遍性的时间观的一体两面。这是从18世纪以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时间观，认为历史发展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只有发现这种规律，人类才能实现进步。在进步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时间观中，人类的理想状态永远是在未来，理想状态永远是在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过去是怎么样的不再重要，当下也不再重要，因为每一刻的当下都是某个未来的前奏，所以为了未来的进步，每一个当下都可以被牺牲掉。在这种新的时间性中，未来获得了主导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进步主义是一种未来的暴政。法国历史学家阿赫托戈就说：“进步主义就是有关完善的理想被时间化了，有关未来和进步的理念以及它所代表的开放性逐渐并不断地与具象为一个终点的承诺分离，完善本身完全让步于可完善性和进步，不光是过去，这被认为已经过时了，而且当下也在未来之名下变得毫无疑问，当下什么都不是，不过是那个若非光辉灿烂，也至少是更好的明天的前夜，而且应该牺牲掉。”这种时间性对于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处理。

进步主义或者历史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和当时欧洲本身的衰弱与后来“一战”“二战”的发生，以及欧洲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反思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动向，包括对于知识客观性的反思，对于理性的反思，还有美学转向，以及对历史时刻的多元性、特异性和偶然性的拥抱等新的思想动向。这是第一次时间危机。

在“二战”之后，对于第一次时间危机的反思仍然在继续，但进步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特别在美国获得全球霸权之后，美国把已经过时的进步主义进一步扩展到了全球。它通过重构全球秩序建构一些新的知识生产场域，比如现代化理论、发展主义等。发展主义的实质就是把西方当下的情况变成南方国家未来可期的发展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把原来的进步主义的时间结构变成一种

空间结构，即原来在西欧社会里面的当下和未来的关系变成南北方国家之间的空间关系，进步主义的时间结构从而得以延续。

这个方案在之后碰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时间性，我们暂且叫它“当下主义”（阿赫托戈语）。所谓的当下主义是说，未来不再重要了，和未来相关的政治想象、政治愿景也不再重要，过去也不再重要，过去人类的经验也不再重要了。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当下。在这种新的时间性当中，当下不断膨胀，不仅侵蚀了过去和未来，而且最终替代了未来，大家都以当下为基点来重新组织过去、未来之间的关系。当下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及其背后的时间性的批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相关，特别是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中超级个人主义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这种当下主义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当下来重新组织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关系，每个人都在追求当下的价值来替代对于未来的超越性的政治价值的想象和追求。这是一种很新的观念，完全改变了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当下主义在政治、经济层面都有很深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它和身份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其造成的问题显而易见。在经济层面上，它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美国的股东革命，其实质就是要把公司每一刻的价值都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取出来。此外，它和消费主义也是密切相关的。在这种当下性中，每个人都成了当下的囚徒，没办法借助过去的经验，也没办法向未来延伸。这是第二次时间危机。

接下来讨论社会科学对时间危机的反应。社会科学是言说和剖析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学术工程之一。如果说时间危机和现代性是密切相关的话，社会科学其实在每一次时间危机中都是最重要的应对者之一，它肩负着提出应对方法，然后实验新时间意识这个重要的任务。对于前述两次重要的时间危机，社会科学都做出了反应，对新的时间意识提出了学术方案。

首先，面对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危机，在欧洲发生了所谓的美学转向和对于历史或然性激进的拥抱等新的学术动向。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欧洲在学术上的反应和美国在学术上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反应后来成了我们今天可见的社会科学中不同的思潮和不同的遗产。

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所谓主观意识的复兴。主观意识的复兴就是社会学家

开始关注在主观意识上如何来重建社会科学的基本价值，以及用主体间性来替代所谓的客观性和绝对的理性。比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建构了一个概念叫理想类型。一方面，理想类型不是客观的，它和 19 世纪的社会科学学术品质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理想类型又不是完全主观的，希望在主客观之间达到调和与重构。和韦伯同时代的还有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这些人推动的新的学术动向都是所谓的美学现代性的一部分，对之前的进步主义提出深刻怀疑。欧洲的这些反应是和欧洲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紧密相连的，因为历史学比社会科学更早地开始关注个体的价值以及历史存在的多元性的问题，历史学家更早地意识到了进步史观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不一样，美国根本没有出现过类似欧洲知识分子幻灭和虚无的状态，根本没有对原来的时间性进行根本的反思。所以，如果说欧洲的社会科学是和历史结合的话，美国的社会科学则和自然科学结合，把原来的进步主义进一步往前推了，并把进步主义进一步实证化了。这个取向也给美国后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问题。

其次，针对当下主义的反应，欧洲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动向，其中之一就是记忆研究的发展。记忆研究一方面是针对当下主义的反动，因为当下主义并不关注历史。记忆研究试图把历史找回来，但是这个找回来的方式很可疑，因为所谓的记忆都是从个人身份出发的，是个人（或某个特定群体）在当下的立场上来重新组织历史，因此有多少个人就可以有多少种记忆，就可以有多少种历史。记忆和历史的极大多元，最后反而可能会导致遗忘。这种对于记忆的书写和作为公共写作的历史的书写其实是不一样的，这种找回过去的尝试又被当下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

在美国也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在笔者所在的历史社会学，对于事件的关注以及对于历史或然性的关注，取代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结构的关注。这里也有很多有待讨论问题，比如什么才是重要的事件，是值得研究的事件？什么才是导致结构变迁的重要事件？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最后又陷入了多元和虚无，陷入了和记忆研究同样的问题。所以，尽管我们现在有好多应对当下主义的新学术方案，但是都没有跳出当下主义的基本框架。未来会怎么样？在政治经济结构面临剧变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重新反思当下主义？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